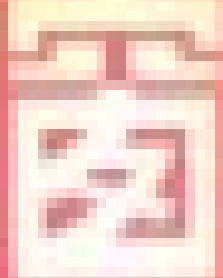


世界之



- 华盛顿的蓝领工人
- 甲壳虫乐队创始人列农之死
- 西方又时兴短发
- 女间谍“月亮女神”的故事
- 七只黑猫的秘密

世界之



世界之窗

目录

封 面		工作之余——日本公园即景	
社 会 生 活	1	华盛顿的蓝领工人 ——一支不受人注意的队伍	〔美〕《华盛顿邮报》杂志
	6	加勒比海的奴隶	〔西班牙〕《白与黑》周刊
	11	一个并不存在的天堂 ——瑞典见闻	〔希腊〕《时事》周刊
当 代 人 物	14	里根与好莱坞	〔美〕《电影评论》
	20	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甲壳虫”乐队创始人列农之死	〔美〕杰伊·科克斯 《新哥伦比亚百科全书》
	26	“甲壳虫”乐队	
	29	歌剧界的金星 ——男高音卢齐亚诺·帕瓦罗蒂	〔美〕《时代》周刊
	37	访问原子弹下幸存者	〔英〕《观察家报》
	42	我只是一个影星 ——记《佐罗》的演员阿兰·德隆	〔法〕《巴黎竞赛画报》
西 方 阴 影	48	特工斗流氓 ——美国联邦调查局与 “黑手党”的搏斗	〔美〕《新闻周刊》
	55	告密者的秘密	〔美〕拉布里奎
	58	“以色列黑手党”	〔美〕《新闻周刊》
	59	阴影中的恐怖	〔美〕《时代》周刊
	62	西德查禁毒品一瞥	〔西德〕《明星》画刊
	67	一个见证人的遭遇	〔美〕格·米切尔
市 场 与 消 费	72	电子玩具大繁荣	〔美〕《国际先驱论坛报》
	74	为左撇子服务的商店	〔西德〕《斯卡拉》杂志
	76	香水专家谈香水	〔法〕《电视电影》
知 识 小 品	78	黄丝带	钱歌川
	82	动物纪念碑种种	〔苏〕《地球与人》
	83	第六感官	〔法〕《历史》杂志

一九八一年 第三期

间 谍 与 情 报	87	当心克格勃	〔美〕约翰·麦克格雷思
	90	“鼯鼠”之战	爱·爱泼斯坦
	97	女间谍“月亮女神”的故事	〔法〕约翰·阿德
	107	冻死的外交官案件	〔加〕《环球邮报》周末杂志
	117	穆萨特女谍	〔法〕《今日情况》周刊
	121	四次核警报是怎么引起的?	〔美〕《生活》杂志
世 界 见 闻	126	家庭地面接收站越来越多	〔美〕《行列》周刊
	129	鲍勃·霍普的“秘密武器”	〔美〕《行列》周刊
	132	监狱里的整容手术	〔西德〕《快捷》杂志
	134	非洲的大象能生存下去吗?	〔美〕《全国地理》杂志
	140	残废的艺术家 ——三个残废的名画家	〔西班牙〕《白与黑》周刊
	142	走向红地毯要跨越的障碍 ——波恩怎样培养青年外交官	〔西德〕《世界报》
	145	坟堂里的居民	〔黎巴嫩〕《事件报》
	148	盖洛普民意测验面临挑战 ——记民意测验专家盖洛普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151	印度新娘的悲剧	〔西德〕《明镜》周刊
	153	议会中的表演	〔美〕《旅游与消遣》
	157	西方又时兴短发	《纽约时报杂志》
体 坛 拾 零	159	橄榄球 ——威尔士民族自尊心的象征	〔法〕《新观察家》周刊
	162	足球场上的丑闻	〔美〕《新闻周刊》
	164	大西洋上的冒险家	〔西德〕《明镜》周刊
侦探小说	167	七只黑猫的秘密	〔美〕艾勒里·奎恩
其 他		东京帝国饭店的“世界钟”(47) 咖啡的妙用(57) 盲人青年骑自行车环球旅行(89) 世界上最长的头发(106) 航空史上的最新发明(144) 漫画 (10)、(61)、(71)、(139)、(152)、(161)	

华盛顿的蓝领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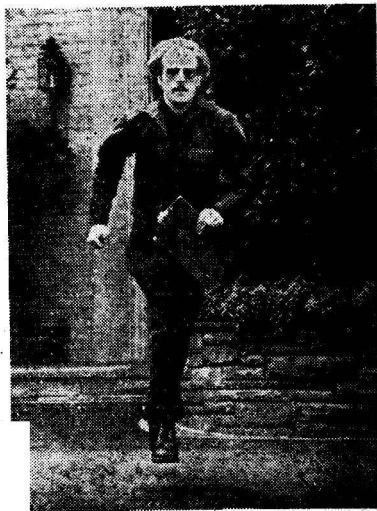
——一支不受人注意的队伍

卡 车 司 机

周末，二十五岁的里克·默克尔在卡尔弗特县的森林和田野中，观看他的猎犬参加南马里兰州小猎兔犬俱乐部组织的捕猎比赛。

星期一早晨，一周的工作开始了，现在是默克尔自己在拼命地赛跑。他的捕猎对象是联合邮包服务公司分配给他的定额，公司规定他每小时至少要分送若干邮包。假如这个公司的某个司机没有完成他的“投递点数”，即工作定额，就会有一个监工手拿跑表坐在他的卡车里，检查他的工作情况。通常的情况是，他必须不断地调整速度，否则就会受到警告，以至最后被停职或解雇。

默克尔说：“毫无疑问，在联合邮包服务公司里，投递员的工作最辛苦，因为干这种工作压力很大。公司给的钱多，但要求也很高。他们知道这些



要求总有个限度，但每次都要你达到这个极限。”

在华盛顿，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会为你打开大门，但是人们不会给邮包投递员开门的。

里克·默克尔了解这一点，因为他出入于市区各办公大楼为联合邮包服务公司分送包裹时穿的就是投递员的制服。他说，他的白领顾客们是不愿帮助他这个蓝领工人的。

“他们看不起你的工作，认为这是低贱的重活。”默克尔说：“如果你推着满满一手车的包裹进入某个律师的办公室，他们连门都不给你开。他们觉得不必为勤杂人员开门，也许他们认为只有他们的工作是重要的。”

默克尔是华盛顿人口中占少数的蓝领工人之一，他们是一支不受人注意的队伍，也就是他们使得这座以政府机构为主的城市具有很高的工作效率，生活舒适。象默克尔那样的司机，还有建筑工人、售货员、日托保姆等蓝领工人，为在这里挣钱糊口，经常忍受社会地位低、工资少、工作条件差和笨重的体力劳动等问题。下班后，他们还得找住房，支付各种费用。由于他们的邻居白领工人购买力高，住房和服务项目价格都上涨了。

和许多蓝领工人一样，默克尔高中一毕业就工作了，开始时他是在晚上为联合邮包服务公司打零工，在兰多弗的分送站挑拣损坏的和地址写错的包裹。白天，他在普林斯·乔治县的社区学院学习会计。他没考学位就离开了学校，成为联合邮包服务公司的夜班工人。两年前，他获得年薪为两万美元的司机工作，在杜邦广场一线开车，直至今天。

每天早上八点四十五分，默克尔就迅速开始工作。司机们每天在兰多弗参加监工召开的会议，了解分送站一天的“赛跑计划”，听取顾客服务部的代表简单讲几句鼓气的话。

“经理召开的会议，你可决不能迟到。”默克尔说：“它本身就是一封警告信。”男女司机都必须遵守“服饰标准”：一套棕色的制服，擦得锃亮的棕色皮鞋，头发不能遮住眼睛，不能超过半个耳朵或盖住部分领子，鬓发不能长过耳根，上须不能长过嘴角，不准蓄山羊胡子或大胡子。

九点左右，默克尔已飞驰在50号公路上开始“跑点”了，他每天在华盛顿要跑一百五十到两百个投递点。他那棕色的卡车装满了约二百三十个邮包，必须在十小时内送完。在回到兰多弗分送站之前，他在途中还要装上三百个包裹。联合邮包服务公司经营的邮包平均每个重二十五磅。在通常情况下，默克尔一天送接包裹的装卸量是七千五百多磅。

午饭时间，杜邦广场的白领工人是在饭店或公园里进餐的。默克尔的午餐是在他送包裹时顺路定一客三明治，送完包裹回来取。他把午餐放在驾驶室里窄小的仪表板上，边吃边转动方向盘，开向市区马路上的另一个投递点。

如果交通拥挤、天气不好或接收的邮包比往常重，司机可以不按时完成定额。傍晚，默克尔在返回兰多弗的途中，常常在马萨诸塞大街上遇到下班时拥挤的车辆，逢到天气暖和的星期五，在50号公路上就会碰上一辆接一辆开往海滩的小汽车而耽搁时间，当他回到兰多弗时，已经七点或七点半了。

下班前，他还得匆匆移交各种报表。全天投递的邮包都是一手交货一手交钱，因此他收到了一大叠收据，他还要对收集的邮包填单子，在自己的时间卡上详细写明每次投递或收集邮包所花的时间。干完这些事需要十二分钟。

“我回到家时，已经累得半死了。”默克尔说，“在工作日期间，你根本无法计划干些什么或上什么地方去，因为实在

太累了。”

默克尔没有结婚，但是联合邮包服务公司的其他司机却有老婆孩子。漫长的工作时间和使人筋疲力尽的速度已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家庭不得不努力适应。

“许多司机的想法是：自己年纪慢慢大了，已经结了婚，需要更多的收入。”默克尔说，“其中有些人受过大学教育或象我这样念过几年大学。他们竭力想学完成材，结果就找上了类似这样的工作，因为他们知道这工作赚钱多。对很多人来说，穿得整整齐齐、系着领带的活不是他们干的。”

在传统的蓝领行业，如运输、印刷、制造和建筑业等工作的工人占华盛顿地区整个就业人员的 15% 左右。华盛顿兴盛的零售和服务性行业也有许多蓝领工人，但是政府部门雇佣的人最多。全华盛顿的工资中有 40% 是联邦或哥伦比亚特区财政部发的。

蓝领工人很多是黑人，这是不足为奇的。华盛顿地区一百五十万工人中，黑人有二十五万，集中在政府和私人企业的蓝领工作。例如，他们占运输工人总数的一半以上，占劳工和服务行业工人总数的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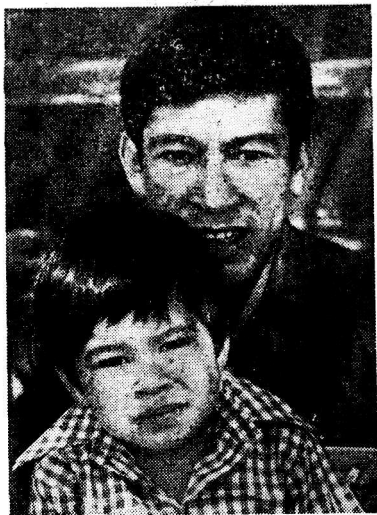
司机里克·默克尔挣的工资不少。联合邮包服务公司司机的工资平均一年两万美元，相当于或超过许多白领工人的年薪。而其他蓝领工人——多数在没有工会组织的行业里工作——挣的工资仅够生活。而且除工资外，他们不象白领工人有提升等其他的待遇。

建筑工人

阿蒂加夫妇已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观察过华盛顿。多年来，这些三十五、六岁的萨尔瓦多移民把美国看作是寻找工作的

绿洲。现在，他们把它看作充满歧视和经济压力的城市。

阿蒂加一家自1968年来到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后一直是模范公民。阿蒂加最初为一个小建筑承包商干活，一小时1.8美元，后来升到一小时13美元的工作。他开始只会搬砖、和灰泥，后来学会了开重型机器，做电工、焊工，为安装大楼和隧道的



钢柱的打桩工人作安排和打样。妻子在家替人看孩子。

几年以前，阿蒂加的作业组接受了一项任务，要把一根七吨重的钢梁移开。这工作要求一个工人坐在钢梁上面的平台上拉吊车的链子，两条腿要悬挂在下面。那天用的吊车只能吊四吨，如果承受不了，直立的钢梁就会倒向一边，把工人的一条腿砸断。其他人都拒绝干，于是监工把阿蒂加找去。

“监工对我说：‘这些人都是大惊小怪，契科。’（西班牙语，意为“小鬼”——译者）他们总叫我‘契科’，从来不管我叫什么名字。”阿蒂加说，“我十分害怕，因为他们挑中了我。假如我不按他们的要求干，他们就会解雇我的。”

阿蒂加回忆说，他走到链子旁边，开始把钢梁向上提，他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吊车承受不住，钢梁倒向一边，阿蒂加的一只脚被压在下面。二十个劳工用撬棍才把他弄出来。

阿蒂加被送到公司的医生那儿，医生给他作了透视，说他骨头没断，要他回去干活。他的脚肿了，疼痛难忍，于是

（下转第10页）

加勒比的奴隶

在二十世纪末期的1980年，加勒比海还存在着贩卖黑人的现象，还有奴隶。在多米尼加方圆数十公里的种植园里，到处可以见到数以千计的衣衫褴褛的海地人和刚果人。他们成天饿着肚子在地里劳动，汗流浹背地收割着甘蔗，手臂上布满了累累伤痕。他们天不亮就被卡车运到种植园，不到天黑不回家。他们每天唯一的食物是水，少量的面粉和大米，偶尔能弄到一条沙丁鱼，那就算是很富裕的日子了。他们讲话时一个个都低着眼睛，他们是遭到贫穷和饥饿所折磨的人。

他们说：“我们总是饿肚子，当我们躺下的时候，当我们睡觉的时候，在我们精疲力竭、无法继续干活的时候，我们就要挨打。”

实际上，在海地已经有很多人因营养不良而死在绿色的棕榈树荫下，由于他们听说，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可以找到工作，可以挣钱赡养家庭，因此就带着一种能够过美好生活的愿望，终于在出国的合同上签了字。但是，一当迈出了这一步，再想回去，那已经太迟了，因为他们受骗了，被甘蔗、警察、军队包围在这片倒霉的所谓制糖工厂的集中营里了。这样，他们不得不生活在可怜の木房子里和茅草棚里。那里，没有水，没有电，没有洗澡间，没有厕所……而草棚又被分隔成一间间没有窗子的小房间，有些铁床已经没有了床垫，只剩下活动的架子。由于刚果人比床还多，因



此大部分人只好睡在地上。

“我们象动物一样地睡在地上，盖着仅有的一点衣服和破纸板。”工人们说。

他们就象住在笼子里一样，感到很冷。如果遇到雨天，又浑身湿透（但甘蔗又必须及时收割，因此他们不得不在热带的暴风雨中干活）。有时候又热得他们没法睡觉，只好睡在露天。

“我之所以离开祖国，就是因为听了政府电台的动员，现在来到这里，只好睡在破麻袋布上了。”——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在绝望中自言自语地说。接着他又沮丧地补充说——“要是我说口袋里有5个生丁（1比塞塔等于100生丁。——译者），那真是撒谎。”

逃，到哪儿去呢？

有些人刚来到这里就想马上逃走，因为他们发觉，长期待在那里，势必饿死。于是他们就收拾起单薄的衣服，夺路逃跑。但是多米尼加人很快就赶到了，持枪威胁：“海地人，你想到哪儿去？你已被卖了，我们已经付了钱，你是属于种植园的。谁带头逃跑，我们就毙了谁。”

再则，逃跑，逃到哪儿去呢？他们的护照全部被收去，交到海

地驻圣多明各大使馆了。在甘蔗收割期还没有结束以前和没有多米尼加政府的命令，是决不会还给他们的。既然他们没有证件了，那末任何人都可以把他们抓起来，扭送到种植园去。这样，他们只好留在那儿，在令人窒息的酷热中劳动而死去，以砍伐甘蔗的数目来计算永远过不完的时间……他们早晨四点钟就起床，要到晚上天黑才收工，种植园里繁重的体力劳动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

美国的“海湾和西方”种植园是这个多民族国家最大的种植园，它几乎独霸着这里的一大片土地。此外还有不少种植园是属于陆军上校、将军和其他私人的。但所有的制糖业工厂都由多米尼加国营糖业委员会控制。现在，海地短工每收割一吨的甘蔗就要支付给105比塞塔，而每个短工一天平均能收割1.8吨甘蔗，这样，按理说可以得到190比塞塔的工资。然而只有在他们收割的甘蔗过磅以后才支付，也可能两、三天都不给钱，这样，他们就连购买必需食品的钱都没有。甘蔗必须运到多米尼加过磅员处才行，而工厂最后把钱正式付给多米尼加人，因为海地人支

付不起那笔可观的小费，所以工厂不直接从海地人那里接受产品。

“有时候收割好的甘蔗十一天不来运，”短工们说，“这样甘蔗就会被晒干，重量减轻，同时我们又没有钱，因此我们就要忍受十一天的饥饿；如果你没有小费……，真会饿死。”

甘蔗最后总得过磅，过磅员和他们的同伙要从中渔利，短工们只能得到多米尼加人愿意给多少就算多少的报酬，甚至经常被诈骗，因为他们不给短工们现钱，只给他们一张能够在生活区的店铺里换取必需食品的凭单。

边境地带有很多巡逻兵监视着这些短工，防止他们与一切革命者、工团主义者、多米尼加神父、牧师和来往的外国人接触。海地人一天天地陷入极度的贫困中，他们在早晨和中午就根本没有什么吃的，必须等到晚上干完了一天繁重的体力劳动，从种植园回来以后，才能准备一点简易的食品。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到最后一天能捎回一点钱回国去。然而，大部分人的愿望都落空了。

干重活的儿童

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有子女，

他们与来到这里的海地女人或多米尼加的最下层妇女结婚。他们永远被人们看作是不合法的劳动者，在一切正式的场合受到歧视；他们要忍受一切苦难的劳动。由于他们完全被抛在一边，因此一切经济法对他们都不奏效。他们须接受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当地人无法忍受的不可靠的生存条件；在劳动中还要遭到残酷的压迫。这些海地人已经无法离开种植园了，因为他们没有合法的地位，实际上，他们已经不被当地人看待了。

一望无际的“海湾和西方”种植园一直从罗马纳延伸到埃尔塞沃河和圣拉斐尔·德尤马海滩，那里的18,000户家庭分散在155家糖厂，其中90%是海地人……在那条尘土飞扬的马路的尽头，在埃尔塞沃地区，十一岁的孩子正在甘蔗地里与甘蔗斗争……每天清晨，他们就在这里为这个多民族国家劳动，工资由过磅员直接支付：半个月175比塞塔。

1963年，每个甘蔗短工一天得到125比塞塔的报酬；而现在，虽然能得到140比塞塔，但对他们来说起不了多少作用，因为生活费已经提高到了113%，使他们的生存力减少了一半以上。

短工们带着疲惫不堪的神色慢腾腾地回到草棚时，已经是晚上七点钟了，整整一天什么也没有吃过，疲倦的脸上带着苦笑，其中最年老的一个人说：

“我六十三岁就到这里来了，现在七十四岁，我简直是一具活着的骸骨，种植园吸干了我所有的血和汗。”

在这里，刚果人受到最严密的监视：“我们走不了，有时我们想到别处去，条件或许会好一些。但是，如果我们逃跑的话，就会被抓住，挨打，受虐待，坐牢，再把我们反手绑起来，送到种植园去。事实上，我们是奴隶。”还算幸运的是，因为“海湾和西方”种植园的工资要比其他国营糖业委员会高出25%。

有些人在熬尽了多年的艰辛和困苦以后，终于能离开这里，他们成了临时工，流动商人，卖彩票的人……但是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

无声的侵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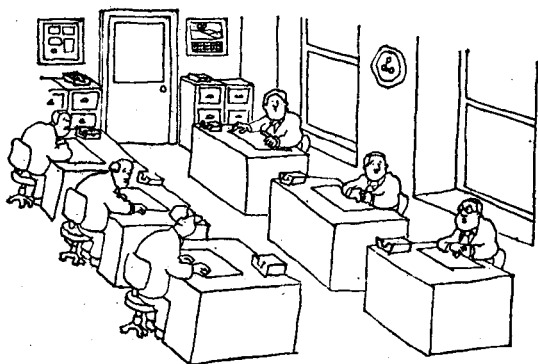
“我被监禁

了两天。”他们其中的一个证实说，“他们对我说，海地人无权在首都行走，接着他们就盯住了我。‘你生来就是为我们收割甘蔗的，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们就揍你，强迫你干。’我回答他们说：‘我家有事，我是到城里来办事情的，请允许我吧。’但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头目却说：‘你离开了海地，就什么事也没有了，现在你没有任何理由去干什么了。’”

(吕柏金译自(西班牙)
《白与黑》周刊第3557期)



种植园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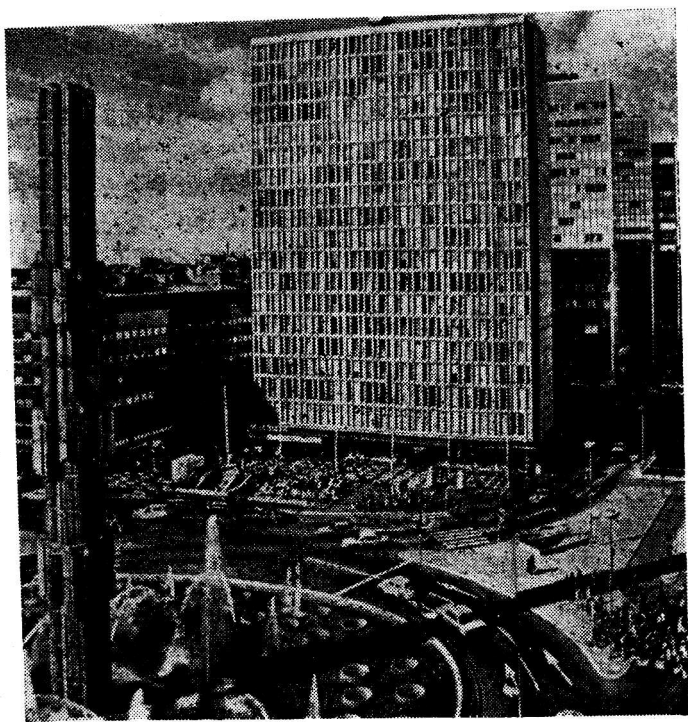
(原载(英)《笨拙》)

(上接第 5 页)

他去找了别的医生，又作了透视，他的踝骨断了三根。就这样，阿蒂加在家呆了一年多，领取的工伤补助只及他平时工资的三分之二(但可以不交税)。刚恢复工作时，一个工友的凿岩锤掉在他那只受过伤的脚上。这次事故发生后很久，阿蒂加仍不太能走动，两个星期以后他被解雇了。

阿蒂加不能当建筑工人了，他就为一家大保险公司在拉美人居住区推销保险单，挣的工资不及做建筑工人时工资的一半。他说，“在建筑业，你干你的活，干完算数。但是推销保险单，你得整天发愁，每天晚上把孩子甩在家里，到外面去推销。在家里的时候，随时都会有电话找你，要求付保险金。压力很大，钱又不多。我宁可当建筑工人，但我不知道——也许永远当不了了。”

(史雁译自《华盛顿邮报杂志》)



一个并不存在的天堂

——瑞典见闻

在斯德哥尔摩塞格尔广场的正中央，矗立着一座用玻璃制作的雄伟高大、形状怪异的石笋状建筑物。它重一百三十吨，

高达三十米，由八万块玻璃组成。四周喷泉围绕、池水盈盈。一到晚上，整个玻璃建筑物内灯火辉煌，煞是壮观。人们会说，这

个富丽堂皇的作品，一方面是抽象派艺术的佼佼者，同时又是没有一点用处的废物，也许它正是现代瑞典的象征。在塞格尔广场的最高处，一座用玻璃和钢铁建成的名叫利克斯坦的豪华大厦，是瑞典议会的所在地。在利克斯坦大厦的旁边，是瑞典规模宏大的文化中心，里面收藏了各种各样的图书、唱片、报刊、幻灯片和录音磁带。在这里，读者可以学习外语，可以弈棋，可以欣赏诗歌，可以看电影，还可以讨论问题。总之这个文化中心，舒适完善、服务周到，甚至为读者准备了给婴儿换尿布的房间。

再往下走，远离利克斯坦和文化中心的地方，却是另一番天地。在这儿和地铁的站台里，常常聚集着没有家庭庇护的年轻人。自然，这种现象只有在警察不在的时候才会发生。这些年轻人麻木的表情和呆滞的眼神最清楚不过地表现着他们的精神状态。海洛因和形形色色的毒品统治着这些地区，这里才是斯德哥尔摩真正的中心。

错综复杂的光谱

瑞典就如大多数国家一样，有它自己的长处，也有它自己的

缺陷，而这些长处和缺陷又如它那个玻璃体象征物一样，往往同时反映在一个镜面里，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

这是一个到处充满了矛盾的国家。最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化试验”把瑞典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试验室。瑞典人天性保守，尽管他们在为平等而奋斗时慷慨激昂，却又满意地容忍王室的存在。在瑞典，当一个幼儿刚满三岁的时候，就会有一份国家的公函到达，通知家长说孩子应当送到幼儿园去了。在瑞典没有贫民窟，也没有人没有房子栖身。失业人数只占百分之二。瑞典人的平均收入虽然和美国差不多，但他们的经济情况却远比美国人好得多。再就是这个国家的交通网四通八达、方便迅速，首都尽管仍然保存着旧日的风貌，却建成了一个完全现代化的都市。然而，瑞典也患上了在整个西方世界泛滥成灾的那种疾病。这种疾病的症状是家庭生活的瓦解、酗酒、吸毒以及集体主义思想和纪律的崩溃。这些东西，把人们最终引进了道德的死胡同。

不过，瑞典最大的问题还是从儿童时代起就娇生惯养的一代新人，这一代人缺少有人性的关

怀，养成了不负责任的禀性。

瑞典的征税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七。诺贝尔基金组织经济委员会主席郎贝尔克教授说：“我们国家的高税制度既毁坏我们的风俗习惯，也毁坏我们的道德观念。我们的教育是免费的，医疗服务是免费的，失业者和老年人的生活是有保障的，我们甚至达到了即便没有医生的诊断书在家里呆上一个星期也可以照领工资的程度。但是，问题也出在这里，一些人不可避免的要利用这些方便，他们到了星期一还要呆在家里睡大觉。星期一和星期二的缺勤率是百分之二十。这也难怪，既然上班也拿钱，不上班也拿钱，为什么一定非要安分守己地去工作呢？我们还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逃税。逃税竟成了一种时髦的运动。”无限度的自由化，个人权利的滥用，已经到达了危害国家和社会道德的程度。对于这一点，郎贝尔克教授说：“我们这些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过来的老年人一天工作也不敢耽搁。可是今天，就连学校的学生都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他们把这些自由化叫做学生权利。”

繁荣没有消灭犯罪

繁荣和贫穷的消灭不仅没有减少和消除犯罪现象，反而起了推动的作用。

在瑞典，一个家庭有两辆汽车是不足为奇的现象，然而偷盗汽车却也同样地习以为常。

犯罪率最高的是二十岁以下的青少年。而且对于十五岁以下的少年犯罪，警察不加过问，因为这个年龄的人属于社会服务部门负责的。

瑞典人现在也不能不承认，在给五花八门的色情刊物以绝对自由的出版和发行权利的时候，他们低估了一些人利用这种自由的手段。瑞典人同意，这些是导致很多青年游荡街头、吸毒、酗酒、追求情欲的部分原因。尽管他们自幼在学校里就接受了性教育，然而瑞典人却遇到了严重的性病问题。

从社会保险和医疗服务等方面讲，瑞典是一个很好的社会，但是它却创造了日益忧郁颓废的一代人。

（杨世杰译自（希腊）

《时事》周刊）